

# 隋唐五代文學史

周祖謨編著



福建人民出版社

# 隋唐五代文學史

周祖譏編著

福建人民出版社

# 隋唐五代文学史

周祖譏編著

\*

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

(福州河东路得貴巷18号)

福建省书刊出版业营业許可証出字第001号

福州第六印刷厂印刷 新華書店福建分店發行

\*

开本787×1092 1/25 印张 8 22/25 字数177,000

1958年8月第1版 1958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1—4,090

统一书号：10104·143

定 价：(7)七角六分

# 隋 唐 五 代 文 学 史

## 目 次

<b>第一章 緒論</b> .....	( 1 )
<b>第二章 隋及初唐文学</b> .....	( 8 )
第一節 隋及初唐文学背景.....	( 8 )
第二節 盧思道、薛道衡与楊廣.....	( 11 )
第三節 王績与魏征.....	( 13 )
第四節 上官仪、沈佺期与宋之問.....	( 16 )
第五節 四杰 附論劉希夷、張谷虛.....	( 20 )
第六節 陈子昂与張九齡.....	( 29 )
<b>第三章 盛唐文学</b> .....	( 34 )
第一節 盛唐文学背景.....	( 34 )
第二節 王昌齡、高適与岑参.....	( 38 )
第三節 孟浩然、儲光羲与王維.....	( 48 )
第四節 李白.....	( 60 )
第五節 杜甫附：元結.....	( 74 )
<b>第四章 中唐文学</b> .....	( 97 )
第一節 中唐文学背景.....	( 97 )
第二節 劉長卿、韋應物、大歷十才子及其他詩人.....	( 104 )

第三節 韓愈与柳宗元	( 112 )
第四節 沈既濟、李朝威与白行簡等	( 128 )
第五節 張籍、王建与劉禹錫	( 137 )
第六節 白居易与元稹	( 147 )
第七節 孟郊、賈島与李賀	( 164 )
第八節 敦煌变文与曲子詞	( 171 )
<b>第五章 晚唐、五代文学</b>	( 179 )
第一節 晚唐、五代文学背景	( 179 )
第二節 杜牧、李商隱与溫庭筠	( 184 )
第三節 皮日休、陸龜蒙与于濱等	( 193 )
第四節 袁郊、裴鉶与杜光庭等	( 200 )
第五節 “花間”詞人与馮延巳、李煜	( 206 )

# 第一章 緒論

## 一、隋唐五代文学概况

自公元581年楊堅建立隋帝國開始，至公元978年吳越滅亡，五代十國分裂局面完全結束止，在這近四百年間，由於封建經濟比較迅速的發展，對源遠流長的文學遺產的繼承，中外文化的交流和科舉制度的建立等種種原因，文學在這一時期獲得了空前未有的繁榮。

隋唐五代文學的繁榮，首先表現在詩歌領域里。魏晉南北朝以來，詩歌一直是人們所最重視的一種文体，不只廣大人民經常喜歡利用詩歌這一形式來表達自己的願望、要求與感觸；而統治者也喜歡寫詩來裝點門面，附庸風雅。所謂“貴賤賢愚，唯務吟咏”，並且“世俗以此相高，朝廷據茲擢士”。（“隋書”“李謾傳”）這都說明了特別重視詩歌這一文体的事實。在這因襲觀念的支配下，隋唐五代的作家，特別重視詩歌的創作，使詩歌在當時各種文体中得到優先的發展，這就成為勢所必然的了。

隋及唐初的詩歌，是在與梁陳以來淫靡的宮體詩風的鬥爭過程中逐漸長成起來的。隋文帝楊堅即位以後，有鑒於這種淫靡文風的流弊，企圖用政治力量來改變它，所以“憲台執法，屢飛霜簡”，但是“時俗詞藻，猶多淫丽”。（隋書“文學傳序”）一直到了唐貞觀（627—649）時，梁陳的宮體遺風在詩壇上仍占着統治的地位，還沒有太多的轉變。甚至於“籠蓋一世”的英雄——唐太宗李世民的創作，在這詩風影響之下，“詩語殊無丈夫氣習”（王世貞：“全唐詩說”）。足見文學領域中傳統力量之大。到了麟德、乾封（664—667）前后，盧照鄰、駱賓王、王勃、楊炯相繼踏上了詩壇，被稱為“初唐四傑”，他們以嘹亮的歌聲來歌唱自己的生活感受，來表現人生的理

想。虽然“遺詞華靡，固沿陳隋之遺”；但“骨氣翩翩，意氣老境”（王世貞：“全唐詩說”），不但作品中的生活內容比較充實，即意境風格上也有了很多的提高，在擺脫梁陳宮體遺風過程中，起了很大的作用。緊接着四傑之後，陳子昂揭起復古的旗幟，從理論與創作實踐上對梁陳宮體遺風進行扫蕩。為唐朝詩歌的發展開辟了一條康莊大道。正如盧藏用所說的：“卓立千古，橫制頽波，天下翕然質文一變。”（盧藏用：“陳伯玉文集序”）

到了開元、天寶（713—756）時，詩人輩出。王昌齡、王之渙、高適、岑參傾向于邊塞生活與風光的描寫；孟浩然、王維、儲光羲則偏重于祖國自然山水與田園生活的調歌。不僅題材多樣，內容豐富，而且形成了不同的流派。即在同一流派之中，各人都有自己風格上的特色。也就在這個時候，天才詩人李白帶着無比的熱情來歌唱當時一些進步的知識分子的理想與憧憬、人類的愛情、友誼、自由與個性解放。並且在一定程度上批判了當時不合理的社會政治制度與統治階級的腐朽生活。在這一時期的詩人中，儘管各人在創作上多少都有自己的特色；但总的看來，在不同程度上，都帶有積極浪漫主義的傾向。

安史之亂（756—763）前后，偉大的現實主義詩人杜甫登上詩壇，他把自己的命運和廣大人民的命運緊結在一起，他以高度藝術的詩筆反映了安史之亂前后二十年間廣大人民的生活與鬥爭，並細致地描繪了祖國的壯麗山水。在他的詩歌中，十分明顯地體現了作者的愛國主义思想、人道主義精神和詩人敦厚的性格。可以這樣說，杜甫詩歌中所反映的當時的政治，社會生活以及廣大人民的思想情緒，遠比有關當時的歷史記載的總和更为詳細，更為生動。古人稱杜甫的詩為“詩史”，為“圖經”；尊杜甫為“詩聖”，是符合于事實的。在創作手法上，杜甫几乎總結了過去一切優良的經驗並加以創造性地發展，使他的作品具有非凡的藝術魅力和永久的藝術生命力，使以後的作家

得到許許多值得效法的經驗，正如宋祁所說的：“殘膏賸馥，沾丐后人多矣。”（“新唐書”“文藝傳”上）。

杜甫以后，在詩壇上声望較高的，有劉長卿、韋應物和所謂“大歷十才子”。虽然他們在選擇題材和詩體的愛好上并不一致，但总的說來都具有現實主義的成份，在不同程度上反映了这时社會生活中最本質的問題。在他們的作品里，虽不乏精巧細致之作，但終嫌氣魄太小，远不能跟上一时期的作家相比拟。由于社會动荡不安，一种憂鬱的情緒，也比較普遍地在这一时期作品中体现出來。

到了元和、長慶（806——824）前后，由于封建經濟進一步發展，社會政治矛盾的更加複雜化和其他种种原因，唐代詩歌進入了第二次繁榮的階段。白居易、元稹、張籍等有意識地學習杜甫創作的現實主義精神，強調詩歌的政治社會作用，利用詩歌這一形式來揭露統治階級的罪惡，來反映人民的痛苦生活，并且使用比較通俗的語言來表达，使詩歌的可接受性大大加強，使詩歌流傳的範圍超出了知識分子階層，深入到广大人民群众中去。元稹曾說白居易的詩，“禁省、觀寺、郵候、牆壁之上无不書，王公、妾妇、牛童、馬走之口无不道。”（元稹：“白氏長慶集序”）正說明這些詩人的作品流傳之广。与白居易、元稹同时的詩人还有韓愈、孟郊、賈島、李賀等，他們的創作一般說來，比較偏重于技巧，他們每个人都創造了自己特有的風格，使这一时期的詩壇變得更為多彩。李肇云：“元和之風尚怪。”（李肇：“國史補”）所謂怪，实际上就是指这一时期的詩人为了創造自己特有的風格，在藝術實踐過程中的一種現象。

太和（827——840）以后，一直到五代十國時，詩歌領域中的現實主義精神有些衰退的征象，很多知識分子沉溺于城市的繁華生活中，虽然他們有时也寫一些帶有社會意義的作品，但以男女生活为中心的創作占了很大的比重，代表詩人如杜牧、李商隱、溫庭筠的詩篇都有上述这种傾向。因此，“側艷”的詩風也就占了上風。在這一

階段的作家中，創作态度比較嚴肅的要算陸龜蒙與皮日休，他們的詩歌雖以描寫其隱居生活為多，但在有些詩篇里對統治階級罪惡的揭露還算是深刻的，風格也比較朴素。此外有于濱、聶夷中等他們的作品對於當時尖銳的階級矛盾也有很好的反映，可惜留傳到今天的作品數量太少，無法了解其全貌。

隋唐五代的散文創作，在天寶（742—756）以前，南北朝以來帶有形式主義傾向的駢文几乎处在完全統治的地位。等到李華、蕭穎士、獨孤及、梁肅登上文壇以後，這種帶有形式主義傾向的文風才有了初步的轉變。到了貞元、元和（785—820）之際，韓愈、柳宗元大力提倡古文，認為文章的內容要有益於社會教化，要求文章散化，並且以創作實踐證明了這種文章在當時的進步性，得到了很多人的擁護。韓愈的文章大多宣傳儒家的倫理道德，但在表現手法上帶有不少的藝術特色。柳宗元的散文則以傳記、寓言、游記三方面見長。從文學的觀點看來，柳宗元的散文中現實主義精神是體現得特別清楚的。韓、柳的創作，不只在當時為一般知識分子所推重，而且歷宋、元而至明、清，一直為後代文人所效法。其影響不能不說深而且廣了。

小說在唐代也有很大的發展，晉南北朝的小說都用以志怪，到了唐貞元、元和（785—820）之際，傳奇小說興起，在內容形式上都有很大的轉變。就內容上說，不再是單純的志怪，而是記述人世間的奇聞逸事，即使有寫到神怪的事，也富有濃厚的人情味。就形式上說，不只篇幅比志怪小說要大，而且述事詳盡，娓娓動聽，繪聲繪色，栩栩如生。舉凡代表作家如沈既濟、許堯佐、蔣防、白行簡、李朝威以及袁郊、裴鉶、杜光庭的作品都有這種特色。他們不僅在小說中奠定了現實主義的基礎，而且為元、明以後的戲劇提供了丰富而又生動的故事情節。

民間文學在唐、五代也有了進一步的發展，出現了新的藝術形式，最值得我們注意的是曲子詞和变文。曲子詞是一種音樂文學，原

先產生于民間，所反映的內容大多是愛情和都市中娼妓的生活，後來逐漸為文人所注意和采用。采用這一文体進行創作成就較大的在唐有溫庭筠，在五代有韋莊、馮延巳、李煜等。溫庭筠、韋莊、馮延巳的詞仍不脫愛情生活的描寫，而李煜的詞除了寫愛情生活以外，更多的是寫自己的不幸遭遇。詞這一文体在唐、五代雖沒有得到充分的發展，但唐、五代詞人的創作為宋詞的繁榮創造了極有利的條件。變文是一種講唱文學，原先是和尚用來宣傳佛教的，內容主要是佛經故事。後來發展成講唱歷史故事。唐五代時的變文從文學的角度看來，雖然還非常幼稚，但內中却表現了豐富的藝術想像力和傑出的誇張技巧。尤其是這種文体本身對於宋代話本小說的產生與發展起了很大的作用。

## 二、隋唐五代文學在中國文學史上的作用

隋唐五代在文學上是一個丰收的時代，不論詩歌、散文、小說，或民間文學都有很大的進展。它不只遺留給我們一筆丰富而又寶貴的精神遺產，而且對後代文學的發展起了很大的推進作用。它在比較全面地繼承了前代文學遺產的基礎上，擴大了文學反映現實生活的範圍，不論國家大事，各階級的生活，祖國壯麗的山河，風俗習慣，遺聞逸事，以及私人的日常生活起居，在文學這一藝術形式中都有很好的反映。同時，在藝術觀點上也有了進步，不少作者進一步明確了藝術的社會功能，強調藝術為政治服務。這對後代文學的發展都有良好的影響。

在文學的創作方法和形式上，隋唐五代的作者們也作了巨大的貢獻。他們不只發展了前代文學中優良的現實主義傳統，而且也丰富了浪漫主義的創作方法。尤其是在詩歌領域內，出現了各式各樣的流派，運用了種種不同的創作技巧，創造了無數種不同的風格。成為後代詩歌的典範。隋唐五代的作家們不只在詩歌領域里完成了歌行、律詩、絕句等新的詩歌形式，並且創造了傳奇、曲子詞、變文等新的文

學式樣。它不只使后代作家在選擇藝術形式上有更多的方便，而且對后代新的藝術形式如話本小說、講唱文學（鼓子詞、彈詞、寶卷等）以及戲劇的產生提供了非常有利的條件。總的說來，隋唐五代文學是魏晉南北朝文學到宋文學的過渡時期，是中國文學發展過程中極重要的一个階段。

### 三、隋唐五代文學的分期

隋唐五代近四百年間，隋及五代，由於國祚較短，在文學上並沒有太大的成就。而成就最大的要算唐代。用文學歷史的眼光看來，隋是唐文學的序幕，五代是唐文學的尾聲。從政權上看，由隋至唐，由唐至五代，雖已改朝換代，但在文學發展上却是一脈相承，是一個不可分割的整体。

唐代文學的發展，並不是直線的上升或下降的，而是曲折的發展着的，這就決定了我們對這時期的文學有分期的必要。關於唐代文學的分期，古人已作了不少的嘗試。宋祁說：“唐有天下三百年，文章無虛三變。”（《新唐書》“文藝傳序”）既有變化，就得劃成幾個階段。可惜宋祁對於各階段的具體劃分辦法沒有清楚提出來。至於唐詩，主張分期的人那就更多了，南宋嚴羽在“滄浪詩話”里把唐詩分成“開元天寶前”“大歷”“晚唐”三個時期，元楊士弘在“唐音”里也主張分成三個時期；到了明高棅則把它分成：初唐（武德——開元初），盛唐（開元——大歷初），中唐（大歷——元和末），晚唐（開成——五代）四个時期。（高棅“唐詩品彙”）以後，張之象的“唐詩類苑”，施匪莪的“唐詩韻譜”，徐增的“而菴說唐詩”，徐用吾的“唐詩分類評釋繩尺”，都有類似的主張。查克弘則主張把唐詩分成五個時期（查克弘：“晚唐詩鈔凡例”）。這些主張，都值得我們參考。

根據隋唐五代文學本身發展的过程看來，我們認為把它分成四個時期是比較適宜的。第一時期，從隋文帝開皇元年（581）到唐睿宗

太極元年（712），這一時期的文學是处在為擺脫梁陳以來形式主義傾向的文風而鬥爭的階段；第二時期，是从唐玄宗開元元年（713）到肅宗寶應元年（762），這一時期是唐代文學最繁榮的階段；第三時期是从唐代宗廣德元年（763）到穆宗長慶四年（824），這一時期的文學是繼承了上一階段的優良傳統進一步發展的時期，除了詩歌外，其他各種文体的文學也有了較多的發展；第四時期，從唐敬宗寶曆元年（825）到五代十國分裊局面完全結束止（978），這一時期是現實主義文學走向下坡的時期，也是唐代文學的尾聲。應該說明，文學的發展象滔滔不絕的長流，前一時期和后一時期很難機械的割斷，分期太死是不妥當的，但是為了能說明各時期文學現象的不同，又不得不分期。在這一矛盾中，我們為了能比較清楚地說明問題，不得不勉強把它劃分成上述的幾個階段。至于橫跨兩個時期的作家，我們只好看他作品的傾向把他划在前一階段或后一階段。總之，我們只能比較靈活地來看分期，不能機械地來看分期。這一點要特別注意。

## 第二章 隋及初唐文學

### 第一节 隋及初唐文學背景

#### 一、國內的統一與南北文風的融合

自東晉南遷，至陳滅亡止，南北分裂的局面延續了二百七十余年。由於南北生產方式的差異，風俗習慣的不同等原因，在文學藝術上出現了不同的傾向。正如“隋書”“文學傳序”所說的：“彼此好尚，互有異同。江左富商發越，貴于清綺，河朔詞義貞剛，重乎氣質。”我們只要拿產生在南朝的清商曲辭和產生在北朝的梁鼓角橫吹曲作一比較，就可看出南北兩地文風的差異。隋文帝楊堅、唐高祖李淵統一全國以後，使南北朝文風得到融合的機會。儘管在隋及唐初的作品里，由文學傾向說，南朝的文風占着統治的地位，但在不少的詩人的創作中，從軍、出塞這類題材是比較多地出現了。這種題材的出現，就政治原因說，當然與這一時期連年不斷的對外戰爭有關，如果從文學本身的繼承關係看來，不能不說有北朝文學的影響。同時，在這些以從軍、出塞作為題材或主題的作品中，經常也寫到閨怨，這與南朝詩人喜歡寫男女關係這一文學傳統也有一定的關係。這種南北文風的融合，使這一時期作家在創作實踐上得到了更多的滋養，為擺脫南朝以來一些形式主義傾向的文風提供了有利的條件。

#### 二、封建經濟的發展及反門閥文學的鬥爭

梁陳以來在文壇上占統治地位的是“競一韻之奇，爭一字之巧；連篇累牘，不出月露之形；積案盈箱，唯是風雲之狀”（“隋書”卷66：“李諤傳”）這種形式主義傾向的文學。這種文學是根植於門閥經濟的基礎上而產生的。隋、唐帝國建立以後，封建經濟有比較迅速的發展，所謂“庶民地主”也大量的興起，他們為了擺脫門閥經濟的

束縛，為了打破南北朝以來門閥壟斷政權的情況，不得不與豪門大族進行鬥爭，因此在文學上也出現了反對梁陳以來形式主義傾向的要求。李諤上隋文帝的“論文書”，就是反對梁陳文風的第一篇文告。從隋文帝到唐高宗初，門閥勢力仍然很大，而“庶民地主”的力量尚处在成長而未壯大的階段，所以在經濟、政治、文學上還不足以戰勝舊勢力。但在新興庶民地主階層作家的作品中，有一點是看得很清楚的，即積極進取的人生理想和這種理想在舊勢力的壓力下得不到實現而產生的不滿情緒。這種理想與情緒正是當時文學中新的質，雖然開始時力量還很微弱，但它一定能發展壯大，終于戰勝梁陳以來形式主義的文學。

到了武則天執政時，“庶民地主”力量有了進一步的發展。同時武則天又有意打击門閥的勢力，所以在用人問題上破格提拔一些出身于新興庶民地主階層中的人物，而這些人大部分是以文學見長而被提拔的。沈既濟說：“初國家自顯慶以來，高宗堅躬多不康，而武太后任事，參決大權，與天子并。太后頗涉文史，好雕蟲之藝。永隆中，始以文章選士。永淳之後，太后君臨天下二十余年，當時公卿百辟无不以文章達，因循日久，寢以成風。”（杜佑“通典”卷15引）這兒應該指出，科舉制度的建立本身就是为了適應地主經濟發展的需要，為“庶民地主”參予政權开辟道路，也是為了更好地實行中央集權（因為科舉制度的選舉權力直接操之於中央，與以前的九品中正制時“鄉舉里察”的辦法不同）。這種制度的建立始於隋煬帝大業二年（606）。但在武則天執政以前，做官的途徑不一定非要應科舉的考試，而武則天執政以後，科舉制度却成為朝廷选拔人才最主要的一種制度，這都說明到了武則天時，新興地主階級力量已經壯大。所以這時候，在文學領域內，反對齊梁遺風的力量也就強大。陳子昂在這時從理論與實踐兩方面來攻擊南朝以來淫靡的文風而得到成功，並且被後來的韓愈認為他是唐代文學的創始人（韓愈：“薦士詩”云：“國朝盛文章，子

昂始高蹈”）。这不是偶然的，正是因为陈子昂反映了时代的要求。

### 三、國力的擴張与中外文化的交流

隋自建國以後，為了保証邊境的安全，有時也為了开拓國際貿易的商路，對外戰爭相當頻繁。隋文帝即位不久，與吐谷渾、突厥發生了戰爭。煬帝時，對外戰爭更加頻繁，尤其是三次進攻高麗的戰爭，在人力、物力的消耗上是非常之大的。唐開國以後，與突厥、吐番、高昌、龜茲、吐谷渾、高麗等都曾前后發生過不少次的戰爭。由於戰爭的頻繁，這一時期在文學上以戰爭或與戰爭相適應的文學題材與主題的作品，也就出現得更多了。其次，由於對外戰爭的經常勝利和有時使用和平方式招致了邊境落後民族的內附，隋唐帝國的國力大大擴大了，這在促進中外文化交流方面，起了很大的作用。在中外文化交流過程中，對我國文化影響較大的，除印度的佛教藝術、文學以外，要算龜茲音樂的輸入。龜茲音樂的輸入雖在北周時，但把它演為中國的音樂却在隋代。“隋書”：“音樂志”云：“開皇二年詔求知音之士，集尚書參定音樂。柱國沛公鄭譯云：考尋樂府鍾石律呂，皆有宮、商、角、徵、羽、變宮、變徵之名。七聲之內，三聲乖應。每恒訪求，終莫能通。先是周武帝時有龜茲人曰蘇祇婆，從突厥皇后入國，善胡琵琶。聽其所奏，一均之中，間有七聲。因而問之。答云，父在西域，稱為知音，代相傳習。調有七種。以其七調，勘校七聲，真在合符。一曰婆陀力，華言平聲，卽宮聲也。二曰鶴識，華言長聲，卽南呂（“南呂”兩字誤當作商。參看“遼史”卷54樂志。）聲也。三曰沙識，華言質直聲，卽角聲也。四曰沙侯加濫，華言應聲，卽變徵聲也。五曰沙臘，華言應和聲，卽徵聲也。六曰般贍，華言五聲，卽羽聲也。七曰俟利箇，華言斛牛聲。卽變宮也。譯因習而彈之，始得七聲之正。然其就此七調，又有五旦之名。旦作七調。以華言譯之，旦者則謂均也。其聲亦應黃鍾、太簇、林鍾、南呂、姑洗五均。已外七律，更無調聲。譯遂因其所撫琵琶，相飲為均。推演其

声，更立七均，合成十二，以应十二律。律有七音，音立一调，故成七调。十二律合八十四调，旋转相交，尽皆和合。”鄭譯演龜茲音乐以后，漢魏以來留傳至隋代的所謂“清乐”，也都改用了鄭譯的方法。唐代虽分“清乐”“燕乐”二部，清乐名存实亡，实际上所用的只有“燕乐”，也就是鄭譯所演的音乐龜茲乐。这种龜茲乐不只对隋唐音乐影响很深，就是对文学也有很大的影响。不只隋煬帝的詩作如“万歲乐”“藏鉤乐”“汎龍舟”等等都是用这种龜茲乐譜奏的。唐代的許多絕句也是以这种音乐譜奏的。在唐代出現的一种新詩体——詞的產生与这种音乐也有密切的关系。

## 第二节 墓思道、薛道衡与楊廣

隋代由于國祚太短，并沒有出現較大的詩人。在当时文壇比較有名望的作家是盧思道、薛道衡、楊廣等。

### 一、盧思道

盧思道（536？—587？）字子行，范陽人。所著今有“盧武陽集”輯本一卷，盧思道的創作就总的傾向說來，仍受着梁陳詩風的支配，这在他的拟乐府如“日出东南隅行”、“美女篇”等作品里表現得很清楚。这些作品內容空虛，情感毫无，都是为了做詩而勉强湊合出來的，如“深情出艷語，密意滿橫眸”（“日出东南隅行”），“清疎看笑淺，嬌深盼欲斜”（“美女篇”），这些詩句与宮体詩如出一轍。但就個別詩篇看來，盧思道的作品还有几篇是比較進步的。如“从軍行”、“听鳴蟬篇”等。在“从軍行”里，一方面反映了隋統一后比較高漲的民族意識，另一方面，也反映了閨中妇女对于征人的怀念之情，意思虽不很新奇（这种內容在同时代的作家如楊素等的作品中都有），但語言比較清新，情感也比較真实，无太多的雕琢之弊。如名句：“庭前琪樹已堪攀，塞上征人去未還”很为后来的唐玄宗李隆基所欣賞。“听鳴蟬篇”可以說是盧思道的代表作。在这首詩里，作者

通过鳴蟬來發抒他在官場淪滯不得意的積憤，也諷刺了無功受祿的权貴們，不但感情真，而且意思深刻，也有較多的含蓄。就這一代來說，確是一篇难得的作品，所以庾信看了這首詩，也“深嘆美之”。

(“隋書”“盧思道傳”)

## 二、薛道衡

薛道衡(540—609)字玄卿，河東汾陰人。歷仕北齊、北周、隋三朝。隋文帝時，授內史侍郎，加儀同三司，詔令多出其手，很為皇帝所重視。煬帝時拜司隸大夫。后因得罪，令自盡。所著今有“薛司隸集”輯本一卷。薛道衡在隋代是成就最大的一個作家。就現存的一些作品看來，他的詩雖仍以愛情為主題，而文辭也華麗，不脫梁陳遺風，但這些愛情詩中却很少色情成分，感情比較真摯，風格也較自然。如“昭君辭”寫昭君出塞和番時的心情，襯以邊庭荒涼景色，自是動人。“豫章行”寫閨中婦女對出征的丈夫的愛情，頗有纏綿悱惻的韵味，如“不畏將軍成久離，只恐封侯心更移”，意思深長，耐人尋味。其他如“昔昔鹽”中名句“空梁落燕泥”，以極自然的文字深刻地刻划了丈夫遠事戎行的家庭中的荒涼景色及妻子的憂郁心情。

“昔昔鹽”一詩雖尚不免有餽釘疊砌之弊，但象“空梁落燕泥”這樣自然而又有深刻含意的句子，梁陳以來，的確是太少見了。“隋唐嘉話”中說隋煬帝就為了這一句，而妬忌薛道衡的才學，殺了他。語雖無稽，但它充分說明了這一句詩在當時的出現是如何的可貴。總的說來，薛道衡無愧是隋代最出色的詩人。他的詩在風格上逐漸朝着清新的方面發展，反映生活的內容雖還狹窄，但感情總還健康；他的創作態度比起過去的一些宮體詩人來是要嚴肅得多了。在薛道衡的詩里，我們可以看到宮體詩風轉變的痕迹。

## 三、楊廣

楊廣(569—618)——名英，小字阿摩，隋文帝楊堅的第二個兒子。他是歷史上著名的荒淫皇帝之一。他的詩與他的荒淫生活是極